

# 高等教育管理的圈层结构：制度保障、要素协同与人才培养

向梦梵，马旭迪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27日

## 摘要

本文基于系统论视角，构建了高等教育管理的“三圈层”结构模型，其中制度-体制-机制构成外围保障层，知识-政治-社会市场构成中层动态要素，人才培养作为内核逻辑主线。文章在界定核心概念并阐明其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圈层间的互动机制，揭示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性特征。该模型旨在为理解高等教育管理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并通过对各圈层互动中潜在张力的批判性审视，为优化高等教育治理、回归育人本质提供理论参考。

## 关键词

高等教育管理，圈层结构，治理现代化，人才培养，系统论

## Circl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lemental Synerg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engfan Xiang, Xudi Ma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April 15,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circle” structural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system-institution-mechanism constitutes the peripheral guarantee layer, the knowledge-politics-social market constitutes the middle-level dynamic elements, and talent training is the core logical line. By defining the core concepts and clarifying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circles, reveal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This model aim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otential tension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ach circle, it seeks to offer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Circle Structur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关系着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 加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速、高校招生体制改革以及高等教育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承担的重要角色等一系列现实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亟待革新。一方面, MOOC 技术颠覆传统教学模式, 人工智能重构科研组织形态, 高校日益成为“数字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 人口结构剧变引发生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重塑学科布局, 这些变革将高等教育管理推入多重张力的漩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 教育行动框架》明确指出, 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已超越传统管理范式的能力边界, 亟需构建新的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1]。

高等教育管理的复杂性源于其独特的系统特征。首先是主体多元性和复杂性, 政府、高校、教师、学生、企业、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共治网络”。其次是目标多重性, 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多重任务目标,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职能之间存在内在张力, 争论持续存在。再者是环境不确定性,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中的重要一部分, 不可避免受环境影响,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 92% 高校实施混合式教学。最后是因果非线性, 简单的政策输入可能引发意外后果, 如德国《高校自治法》虽扩大办学自主权, 却意外加剧了学科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 高等教育管理要适应高等教育形势的新变化, 探析当前高等教育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2]。

而高等教育管理传统管理理论在解释上述复杂性时遭遇解释困境: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难以描述高校“松散耦合”的组织特性; 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效率导向忽视了教育本质价值。相比而言, 本文所论述的高等教育管理圈层模型(见图 1)更能解释上述复杂性, 是系统性思维的具象化表达。

###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模型的理论基础

为构建一个严谨的分析框架, 首先需要明确模型中核心概念的内涵。“制度”在此指涉的是规范高等教育活动的根本性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 它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强制性, 为整个系统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边界。“体制”则是制度在组织结构上的体现, 涉及权力分配、层级关系与职责划分, 如国家 - 地方 - 高校三级管理体制以及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体制”是静态的结构安排。“机制”则是保障制度与体制有效运行的动态过程与方式, 包括决策、执行、评估、激励、协调等, 是连接结构与功能的“操作系统”。本文将三者共同置于外围保障层, 其理论依据在于: 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制度、体制、机制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刚性骨架”。它们为系统中所有主体的行为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和框架, 决定了中层要素(知识、政治、市场)互动的基本规则与资源分配方式, 并对内核(人才培

养)起着根本性的塑造与约束作用。这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亦有相通之处,即结构(外围层)既是行动的媒介,也是行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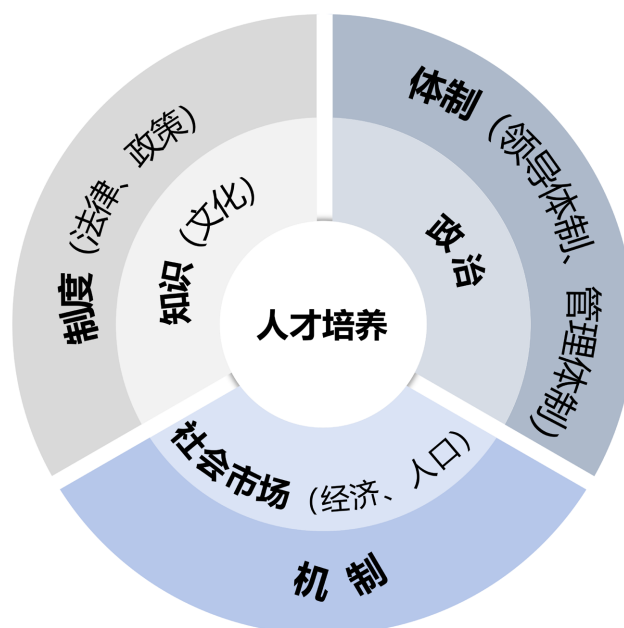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图 1. 高等教育管理的圈层结构

## (二) 本模型与既有治理理论的对话

本研究所构建的“圈层结构”模型,旨在与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理论形成对话与互补。网络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与信任合作,但其对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关注不足。本模型的外围保障层恰好揭示了这种互动所嵌入的制度性前提,即任何治理网络都运行在特定的制度、体制与机制所构成的框架之内。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多个决策中心的竞争与合作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其对治理层级间内在张力的分析相对薄弱。本模型通过区分外围保障、中层要素与内核主线,清晰地展示了不同治理层级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相互作用:中层要素的动态博弈需要外围层提供规则与秩序,而其博弈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内核层的人才培养。因此,本模型并非要取代既有理论,而是试图通过系统整合,将制度分析的宏观视角、要素互动的中观视角与人才培养的微观视角统一起来,为理解高等教育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 2. 外围保障: 制度、体制与机制的协同运作

高等教育管理圈层结构的外层是维系高等教育系统稳定运行的刚性框架,其制度、体制与机制构成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不仅为教育系统的有序运转划定边界,更通过资源配置、权力制衡与冲突化解机制,保障高等教育系统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 (一) 制度层: 价值规范与行为约束的立法维度

制度层作为外层结构的顶层设计,是以法律、法规、政策为核心构成的规则体系。它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根本性法律,确立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导向,如教育公平、学术自由、质量保障等核心价值。在具体规范层面,学位条例、学科专业目录、教育评估标准等制度文本,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制度层的刚性特征体现在其权威性与稳定性,

这种制度刚性不仅规范个体行为,更通过资格认证、经费划拨等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对高校办学的实质性约束。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经历了“法规体系化-制度创新-治理现代化”的三阶段跃迁[3]。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领域面临“无法可依”的制度真空。1980年《学位条例》的颁布打破僵局,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出台[4]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高校“独立法人”地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框架。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传统行政化管理模式遭遇质量危机。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制度创新进入以章程建设为核心的2.0时代。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面临质量革命与数字化转型双重挑战,“放管服”改革成为制度供给3.0时代的核心逻辑。2015年《高等教育法》首次修订,将“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写入总则,开启制度创新新篇章。

然而,制度演进并非一帆风顺。当前制度层面仍面临体制僵化、资源利用效率低、开放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社会服务满意度不高以及创新活力不强等挑战。因此,制度设计需更具前瞻性与灵活性:首先是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实施“管办评”分离,强化高校法人地位,同时构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的多元共治机制。其次是完善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建立不同类型大学的分类评价体系,破除传统“五唯”评价体系,同时引入国际认证机构与行业组织参与评价。再者是进行学科与人才培养创新,建立与产业需求联动的学科目录更新机制,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加强“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合作教育。

### (二) 体制层:组织架构与权力配置的结构维度

体制层是制度规范在组织层面的具象化呈现,涉及组织的层级关系、权力分配、职责划分等。在宏观层面,教育部-省级政府-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通过《高等教育法》确立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政府统筹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形成纵到底、横到边的治理网络。在“集体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复合结构中,纵向权力配置与横向制衡机制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5]。微观层面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则通过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构建起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机制。

中国特色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其核心在于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高校实行的是以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这是一种旨在保证办学方向与行政效率的独特制度设计。在这一结构中,如何界定领导层的决策领导权与校长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如何保障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自主权,构成了一个持续的“调适”过程。2014年相关实施意见的出台,旨在通过细化权责清单,构建更清晰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工界面。

我国高校的内部管理结构可分为两类:校-院-系(学科)结构和校-学部-院结构。前者的校-院-系结构以清华大学为例,32个学院下设54个系,这种结构以教学为中心,不利于科研的进行,是一种传统的权力结构模式。后者校-学部-院结构以北京大学为例,在8个学部下设75个学院,学部根据学科门类进行设置,适应了科学知识综合化发展需要、人才多样化发展需要和重大项目合作研究需要。此外,还有高校集群组织管理机构,通常为实体性结构或虚拟性结构——校,这种机构一般是为应对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要或区域经济重大战略发展需要而设立。

### (三) 机制层:动态调节与效能优化的运行维度

机制层是连接制度与体制的操作系统,其本质是保障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动态调节装置。决策机制方面,通过重大事项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制度安排,将科学决策与民主参与有机结合。执行机制则依托项目管理、绩效拨款等工具,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

评估机制的创新尤为关键,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机制正经历从传统的行政评估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质

量保障体系。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6]的出台,标志着质量保障进入新阶段。评估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分类评估。评估目的从“证明”转向“改进”,建立“评估-反馈-整改”闭环。在冲突化解层面,申诉机制、调解机制与仲裁机制构成三级防护网。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纠纷裁决权、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复议职能、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判权,形成梯度化的权利救济通道。资源分配机制则通过竞争性经费拨款、重点学科建设等杠杆,引导高校在差异化发展中实现整体提升。

综上,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结构通过“制度决定体制框架、体制承载机制运行、机制反馈制度优化”的循环逻辑,形成自我完善的治理闭环。但当前仍面临制度滞后性、体制僵化、机制虚化等挑战。破解之道在于:建立制度动态修订机制,完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监管机制,最终实现从“刚性框架”到“韧性治理”的范式转型。

### 3. 中层要素:知识、政治与社会市场的动态博弈

高等教育管理圈层结构的中层是驱动系统运行的枢纽,其核心在于知识生产、政治嵌入与社会市场三要素构成的动态博弈场域。这种博弈既体现为资源分配的显性竞争,也表现为价值渗透的隐性规训,最终通过要素间的张力与平衡,塑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才培养实践形态。

#### (一) 知识生产:学术创新与模式转型的双重变奏

高等教育活动主要是知识生产活动,包括知识的传递与继承、发展与创新。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主要是对知识生产活动的管理,这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中心环节。知识生产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活动,其有效推进依赖于多重条件的协同支撑:自由精神奠定知识探索基石,学术团队作为核心主体,其智力积淀与协作直接影响研究深度;物质保障涵盖出版支持、经费投入与信息平台,技术革新则不断拓展研究边界与效率,共同推动认知深化。

在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正经历从“单科学术生产”向“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转型。传统“模式I”以学科边界清晰、学术共同体内部循环为特征的知识创造体系,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冲击下逐渐瓦解。而“模式II”则呈现问题导向、跨学科协作、社会参与等新特征[7],推动研究者跨越机构边界形成全球协作网络。

然而,知识生产的转型也催生了“学术资本主义”现象,其带来的影响是双刃的。一方面,学术资本主义鼓励高校教师通过专利转化、技术入股参与市场活动,加速了知识向生产力的转化,并为高校开辟了新的经费来源,增强了其服务社会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当科研评价过度依赖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等量化指标时,知识生产的工具理性便可能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8]。这种异化在学科布局中尤为明显: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学科获得资源倾斜,而基础研究领域和传统人文学科则面临生存危机,可能导致学术生态的失衡和长远创新能力的削弱。面对这一挑战,需要建立更精细的资源配置机制,既要鼓励应用研究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也要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优化评价体系等方式,为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创新提供保障,促进不同类型知识的协调发展。

#### (二) 政治嵌入:政策规训与价值渗透的双重逻辑

政治嵌入通过政策规训与意识形态渗透,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通过学科评估、经费配置等政策工具,构建起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种规训不仅体现为硬性指标(如ESI学科排名、国家级科研平台数量),更内化为高校的办学行为逻辑。政治嵌入确保了教育发展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为高校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资源支持。

然而,行政逻辑的深度嵌入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当学科评估、职称评审等制度设计过度强调量化指标时,可能催生高校的功利化行为,如片面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原创性研究,或为迎合评估指标而进

行短期行为。例如,某省属高校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作为晋升硬指标,初衷良好,但若执行中演变为简单量化“项目级别”,则可能忽视教师基于学术兴趣的长期探索。在学科评估中,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纳入评价指标,有效推动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融合,但学界也存在对此类指标如何科学衡量、是否可能增加教师行政负担等问题的讨论[9]。因此,如何在发挥政治嵌入方向保障作用的同时,避免其演变为僵化的行政命令,建立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良性互动,是高等教育治理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管办评分离改革正是试图破解行政化困局的重要尝试。教育部2020年出台《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10],旨在引入第三方评价,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为学术发展释放更多自主空间。

### (三) 社会市场: 需求驱动与资源争夺的双重张力

社会市场通过人才需求与资源配置,对高等教育施加持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市场规模突破3万亿元的背后,是产业结构升级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市场力量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灵敏的需求反馈,促进了产教融合,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元的实践机会与就业渠道。民办高校凭借灵活机制,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领域快速扩张,形成与公立高校错位竞争的格局,丰富了教育供给。

但市场逻辑的过度渗透也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是资源争夺的马太效应。公立高校依托政府支持占据资源优势,而民办高校则通过校企合作、国际认证提升竞争力。这种竞争在招生市场尤为激烈,可能导致高校将大量资源投入“抢生源”的营销战,而非静心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其次是人才培养的功利化倾向。当就业率、起薪水平成为专业评估的核心指标时,教育的育人本质便可能被技术理性遮蔽,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等长周期、难量化的素质培养可能被边缘化。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资本介入、人口结构变化与区域发展差异构成三大作用力,重塑着高校的战略选择与行为逻辑[11]。例如,出生率下降直接冲击传统专业设置,某省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2025年招生计划较2019年缩减62%,而人工智能专业扩招2.3倍。这种变化要求高校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如江苏省构建“就业率-招生计划-经费拨款”联动模型,对连续3年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实行红黄牌制度。这一机制体现了市场的倒逼作用,但也需警惕其可能导致基础学科或冷门但国家长远所需专业的萎缩。

三要素的博弈并非零和游戏,而是通过动态平衡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北京建筑大学构建的“一生一策”培养方案,既体现知识生产的个性化需求,又符合政治嵌入的立德树人要求,同时对接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种平衡在实践中表现为:课程体系重构,打破学科壁垒,设置跨学科课程模块;培养机制创新,实施“三制五化”(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等),既保障学术深度,又强化实践能力;质量保障升级,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多元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成效、市场满意度纳入评估维度。

## 4. 内核主线: 人才培养的核心逻辑

高等教育管理圈层结构的内圈是人才培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才培养的质效提升。基于价值、知识、能力三重维度的逻辑主线[9],内核层的逻辑应在于,如何在外部圈层的影响下,保持其作为教育本体的主体性。

### (一) 价值维度: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动态平衡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张力源于教育目标的双重性:既要培养“完整的人”,又要满足职业需求[12]。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改革为此提供了典范。其《红皮书》提出通识教育需培养“有效思考、沟通、适切判断和价值判断”四大能力,并通过人文、社会、自然三领域课程构建知识框架。然而,过度强调通识教育可能导致专业能力弱化,如中国部分高校推行“大类招生”后,学生因专业分流延迟而缺乏深度技能训

练。理想模式应实现“通专融合”：例如斯坦福大学通过“技术与社会”课程，将伦理学嵌入人工智能教学，既拓展人文视野，又强化技术伦理。

### (二) 知识维度：学科交叉的困境与突破

学科交叉是颠覆性创新的源泉，但实施面临结构性障碍[13]。以“新工科”为例，30%的课程需跨院系协调，但教师考核仍以单一学科成果为主，导致合作动力不足。广东工业大学的“主体专业 + 跨界专业”模式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首席教授责任制”整合学科资源，构建跨院系教学团队，实现课程内容与产业链需求的无缝对接。阳光学院的“产业链办学”更打破传统学科逻辑，依托龙头企业需求设置纵向专业群，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重构知识生产逻辑。这体现了人才培养如何主动应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

### (三) 能力维度：创新创业教育的风险治理

创新创业教育需平衡冒险精神与风险管控。斯坦福大学通过“失败履历表”作业和创业案例库建设，将失败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其“五美元创业挑战”要求学生以极低成本验证商业模式，培养“低成本试错”思维。然而，过度强调风险可能抑制创新，如中国高校的创业竞赛常因追求“成功率”而规避高风险项目。理想路径应构建“容错 - 反思 - 迭代”机制：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设立“创业安全网”基金，为失败项目提供二次孵化支持，降低试错成本。

##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系统论述高等教育管理的三维圈层结构模型，深入剖析了制度保障、要素协同与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该模型揭示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并试图为理解其运行机理提供一个整合性框架。基于“三圈层”的互动逻辑，本文提出以下更具针对性的思考：

首先，针对外围保障层，应着力提升制度的“韧性”以缓冲中层要素的过度冲击。当前制度设计在应对中层要素(如学术资本主义、市场功利化)的负面影响时，常显滞后或刚性。未来制度创新应注重构建“弹性”机制。例如，在资源配置上，不应仅依据短期市场表现或量化指标，而应建立基础研究、人文社科等“冷门绝学”的稳定支持与保护制度，以平衡市场力量对学科生态的冲击。在评估机制上，应引入更多定性评价和长周期评估，避免因过度量化而加剧行政化与功利化倾向，为中层要素的良性博弈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空间。

其次，针对中层要素，应致力于建立知识、政治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博弈规则。三要素的博弈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如何设定规则，使其博弈结果更趋向于公共利益与教育本质。应明确区分政治嵌入的“方向引领”与“微观干预”，在确保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将学术评价、教学安排等专业事务的自主权更多下放给学术共同体，避免行政权力的越界。对于市场力量，应将其限制在资源配置和需求反馈的辅助角色，通过制度设计防止资本逻辑对教育公益性的侵蚀。例如，在推进产教融合时，应制定清晰的规则，保障高校在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和学术自主性，确保校企合作服务于人才培养而非单纯的商业利益。

最后，针对内核层，人才培养应保持其主体性，避免被外部力量过度塑造。在应对外围层的制度约束和中层要素的博弈压力时，人才培养不能被动适应，而应主动建构。这意味着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能力培养与人格塑造有机统一。具体而言，高校应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标准上保持教育定力，不为短期市场热点所左右，不为单一的量化指标所异化。例如，在推行创新创业教育时，应将其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和韧性品格的过程，而非仅仅追求创业成功率和经济效益。人才培养的核心逻辑，应始终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引领变革的“完整的人”，而非仅仅是满足即时市场需求的“工具人”。

本文论述的圈层架构模型揭示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微观主体

行为动机、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以及终身学习体系下的管理机制创新等问题。同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各种挑战也在不断增加, 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段以适应这些挑战, 推动高等教育管理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胡佳佳, 吴海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 2030 行动框架』描画全球未来教育的模样[J]. 重庆与世界(学术版), 2017(12): 13-16.
- [2] 王立梅. 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M].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22.
- [3] 赵翌.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思考[J]. 高校后勤研究, 2024(3): 71-74.
- [4] [https://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927.htm](https://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927.htm), 1998-08-29.
- [5] 夏鲁惠.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40 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发展观察, 2018(24): 5-9.
- [6]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07/content\\_5585584.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07/content_5585584.htm), 2021-01-21.
- [7] 郭晓丽, 孔照胜.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大学学科建设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 45(9): 8-12.
- [8] 丁亚金, 蔡文伯, 董华容. 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大学治理变革研究[J]. 高等农业教育, 2012(11): 15-19.
- [9] 宫雪璐.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成才之路, 2024(11): 1-4.
- [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2/19/content\\_5480977.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2/19/content_5480977.htm), 2020-02-19.
- [11] 李立国.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中寻求治理现代化之路[J]. 内蒙古教育, 2020(30): 1.
- [12] 王佳杰, 石伟平. 数智时代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4(23): 47-53.
- [13] 张宇晴, 周彦波. 高校交叉学科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J]. 西部素质教育, 2025, 11(1): 55-58.